

野生大熊猫的影像。

(2) 兼顾社区发展的保护模式

与中国绝大部分保护地一样,社区也是老河沟保护中重要而特殊的参与者。让社区在保护的过程中受益,是实现保护成效的前提条件之一。TNC在保护区外围设立“扩展区”,将生产经营活动集中于该区域,尽可能减少人类活动对保护区的干扰,同时使社区老百姓通过定制农业、民宿经营等方式获得收益。2017年参与定制农业生产的农户达105户,占全村户数的50%,定制农产品的营销额已经从最初的7万余元增至120余万元,为社区农户创造了可观的增收效益。

(3) 社会组织参与国家公园建设的先试先行

2017年4月,《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印发,包括老河沟在内的其他不同级别的保护区一同被划入大熊猫国家公园范围内。在这面积超过2.7万平方千米的区域内,国家公园建设如何促进自然资源的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是一个巨大的课题,TNC在老河沟项目中示范的“社会参与机制”“社区协调发展”及“整体保护、系统保护”等经验,可以为国家公园建设提供有意义的参考及借鉴。

二、TNC思考与建议

随着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推进,以及《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的印发,中国国家公园的定位、内涵已经明晰。TNC结合在中国20年的保护工作经验以及在云南和四川的实践经验,提出如下两点思考:

1. 统一机构管理下的综合授权管理,将实现国家公园的多元社会参与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明确了“将由一个部门统一行使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管理职责”“履行特许经营管理、社会参与管理等职责”;结合“国家主导、共同参与”的基本原则,《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有望帮助试点省份及国家公园理顺管理者之间,及管理者与经营者、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多头管理的问题将得以解决,特许经营或将成为主要经营模式,社会组织将有更多的参与机会。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提出“国家公园支出由中央政府出资保障”,这充分确保了国家公园的公益属性,并将促进特许经营管理的不断精细化。特许经营模式区别于传统的排他、一揽子经营委托,强调对资源有较大影响的基础设施项目应有国家来投资,只将部分设施的运营通过特许经营的方式由不同的企业来运作管理。以保护资源完整

性为原则,以社会和环境绩效为导向,管理者对特许经营经营者进行严格监督管理。

“探索社会力量参与自然资源管理和生态保护的新模式”是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主要方向之一。TNC在云南和四川的保护地实践都充分证明,社会组织在模式创新上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灵活性。国家公园的建设,可以结合社会组织的愿景及特长,在科学保护、志愿者体系、环境教育、解说导览等领域,授权专业的社会组织进行管理。

2. 运用科学保护方法来管理中国最重要的保护地类型

国家公园的空间布局将依赖于国家公园的设立标准、建设数量和规模。在这一尺度上,TNC与国家生态环境部合作开展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远景规划项目”识别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可以作为决策的一项参考依据。就单个国家公园的划定,TNC的生态区评估这一科学方法可以帮助设定保护优先区,明确标示出特定区域内的生物多样性、物种栖息地、保护空缺、威胁因子以及影响当地生态状况的各类数据。TNC在云南的5个保护优先区和四川老河沟项目就是通过这套科学方法被确定的。

在单个国家公园范围确定后,TNC的保护项目管理方法——保护行动规划可以帮助制定保护对策及其成效评估的管理系统。既可以针对单个公园,也可以针对公园内特定区域的保护项目制定保护计划、实施步骤及监测评估体系、动态管理方案等内容。

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及国家公园的管理将由政府主导,社会公益组织作为辅助角色参与其中。TNC在国家公园模式推广、社会组织参与保护、社区发展等方面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可以为国家公园的建设和保护提供科学方法、实践案例,助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作者系该协会云南保护项目总监;收稿日期:2018-06-05)

国家公园开展生态旅游和游憩活动的适宜性探讨

张玉钧,薛冰洁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北京 100083)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8.08.007

伴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对自然的认识也在发生着变化。有时人们把自然看作是一种可利用的资源,因而称自然为自然资源;有时又通过生物多

样性来表现自然界多样性的程度,它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和它们所拥有的基因以及它们与其生存环境形成的复杂的生态系统。生态系统是由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群落以及无机环境相互作用形成的一个动态、复杂的功能单元。人类是生态系统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生态系统服务是指生态系统结构及功能发挥的过程中为人类提供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与效用。这种服务不仅提供物质性生态产品服务,同时还包括维持地球生命物质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水文循环、维持生物多样性、调节气候、涵养水源、净化环境、减轻自然灾害等多方面服务。概括说来,生态系统服务包括供给、调节、支持和文化服务4大类。其中,游憩和生态旅游属于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中的一类。国家公园的生态系统通常具备典型性和代表性,在国家公园开展生态旅游和游憩活动,也是发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一种具体体现形式。

在国外,美国和加拿大等国一直倡导在国家公园开展游憩活动,也影响着世界其他国家国家公园的游憩发展理念和管理方式。同时,形势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同样是在美国,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生态旅游与早期的户外游憩产生融合,两者之间的界限变得逐渐模糊起来,意味着生态旅游有时成了户外游憩的同义语,甚至在很多场合生态旅游反倒用得多了起来。受其影响,近几年国外有些国家的国家公园在开展游憩活动或对外宣传时索性开始直接使用生态旅游了。例如澳大利亚的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就变得更加常见,但前提是开展生态旅游活动的国家公园需要具备生态旅游资质,而许多国家公园并不具备这样的资质。据笔者考察过的有限的几个国家如肯尼亚、俄罗斯、日本及韩国等国的国家公园,就全部或部分使用生态旅游一词了。如此看来,生态旅游和游憩往往是国家公园同时兼有的功能。

基于自然保护的角度,第一个给出生态旅游定义的是20世纪80年代担任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顾问的墨西哥籍专家Lascuráin,他的生态旅游概念影响深远,后来被全世界广泛接受。他指出,生态旅游是“旅游者进入相对原始的自然区域,学习、欣赏和享受自然风光、野生动植物及当地古今文化的旅游”。世界自然基金会(World Wildlife Fund, WWF)是研究生态旅游比较早的官方机构,其研究人员布在认可上述定义的同时,又强调生态

旅游必须以“自然为基础”。国际生态旅游学会(The International Ecotourism Society, TIES)进一步指出,生态旅游就是在自然区域里进行的、保护环境同时维持当地人福利的负责任的旅游。一般说来,生态旅游具有以自然为基础、开展环境和文化教育以及包括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当地社区在内的可持续管理的特征。在这种背景下,2002年国际生态旅游年大会发布的《魁北克宣言》特别强调了生态旅游的5条标准:即以自然为依托的产品、影响最小化管理、环境教育、为保护事业做贡献、为当地社会做贡献。因此,生态旅游与游憩活动融合在一起,被赋予更加深刻的内涵和鲜明的特征,为今后各种类型的自然保护地开展相应的活动注入了活力。

在国内,由于前些年各类自然保护地在管理体制上各自为政,从而导致保护地体系结构不合理、管理交叉重叠、资源权属不清、资金投入不足和公益性缺失等问题的出现。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在2018年年初适时出台,并组建了新的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为此在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的前提下,采取措施统筹森林、草原、湿地监督管理,进一步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从而整合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等各类保护地的管理职责。在理顺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的基础上,依托每一类保护地的资源特征和规划理念,将生态旅游的理念贯穿于相应的保护地的规划中,以维持其生态功能为宗旨,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容量,组合开发不同类型的生态旅游产品。

在国家公园内开展生态旅游活动符合重视和保护原始自然景观、野生动植物以及独特地域文化的理念,也正因为如此,国家公园具备生态旅游的吸引力来源和物质基础。国外国家公园内游憩活动及管理已经形成一系列理论体系和技术成果,可供国内建设和管理国家公园借鉴,其中包括:(1)市场细分理论(MS,20世纪50年代,美国);(2)环境影响评价制度(EIA,20世纪70年代,美国);(3)游憩机会谱(ROS,20世纪80年代,美国);(4)可接受的改变极限(LAC,20世纪90年代,美国);(5)游客影响管理模式(VIMM,20世纪90年代,美国);(6)游客行为管理过程(VAMP,20世纪90年代,加拿大);(7)旅游管理优化模型(TOMM,20世纪90年代末,澳大利亚);(8)游客体验与资源保护管理(VERP,21世纪初,美国)。此外,国外已有大量文献对国家公园内生态旅游的市场和产业进行了充分的研究,

关于游客方面包括游客行为特征、心理偏好等;关于旅游规划方面包括功能分区规划、社区共管、服务设施等;关于旅游环境保护方面包括了游憩承载力、生态补偿、教育解说以及环境影响评价等微观层面内容。上述关于游憩活动及管理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对在保护生态系统完整性的基础上促进游憩空间优化提升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017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要求对自然生态进行最严格的保护,并世代传承下去。十九大报告更是提出“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主体功能区配套政策,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由此看来,以国家公园为载体来保护自然资源、发展可持续的生态旅游已经成为新的研究发展趋势。国内已有文献开始探讨如何吸取国外国家公园规划、建设和管理经验,应用于中国本土的保护地旅游实践中,但由于目前中国的国家公园尚处于试点建设阶段,大部分研究主要针对国家公园概念认知与国外国家公园管理模式借鉴以及经典案例分析研究,关于国家公园内部开展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旅游研究内容较少。因此,其他类型保护地研究的理论成果和标准体系可作为国家公园未来发展的重要参考和科学依据。有关保护地生态旅游理论基础包括区域生态安全格局观念、可持续发展理论、生态承载力理论、生态伦理学、景观生态学、生态经济学、循环经济理论、生态旅游本土化理论以及系统工程学等。同时对保护地生态旅游的开发模式、综合评价以及存在问题进行了充分探讨。目前研究对于保护地生态旅游研究方法和游憩管理模式等欠缺宏观提炼和总结,大多数研究主要进行理论阐述以及某些特定案例对比分析等定性分析,定量研究不足。今后的研究应关注对保护地的生态、文化、社会和经济方面提出综合性、系统性的研究和规划,将国外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发展模式及空间布局规划技术本土化,寻求包括国家公园在内的保护地的可持续生态旅游发展路径。

涉及国家公园生态旅游的未来发展,今后的研究重点将聚焦到对户外游憩资源的保护利用与管理上来:一是如何利用好游憩资源,保护好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确保资源环境对使用者具有的长久吸引力,最终实现游憩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如何应对游憩需求的多样化,为使用者提供更加满意的游憩体验。

(第一作者系该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二作者系该院博士研究生;收稿日期:2018-05-29)

践行“两山理论”:生态旅游发展的核心价值与实施路径

马 勇¹,郭田田²

(1. 湖北大学旅游发展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62;
2. 湖北大学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8.08.008

“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经济发展同生态保护关系生动而深刻的论述。其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思想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十三五”规划、《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等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文件和顶层设计中。“两山理论”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习近平曾在《之江新语》上旗帜鲜明地提出,“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优势,那么绿水青山也就变成了金山银山。”由此可见,生态旅游成为践行“两山理论”的良好载体和重要途径,是其作为美丽产业、无烟产业的应有之义。生态旅游发展有助于实现“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的跨越。充分认识生态旅游在旅游产业中的特殊地位,科学厘清生态旅游发展的核心价值,正确设计生态旅游发展的提升路径,是现在及未来一段时期值得我国政府、学术界以及产业界共同关注的焦点议题。

一、再认识:生态旅游在旅游产业中的特殊地位

生态旅游概念的提出是面对严峻现实的积极响应,基于拉丁美洲地区经济发展同生态保护关系日益紧张的困境,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特别顾问Ceballos-Lascuráin于1983年创造性地提出了西班牙语词汇Ecoturismo。1990年,国际生态旅游协会(The International Ecotourism Society)将生态旅游定义为:在一定的自然区域中保护环境并提高当地居民福利的一种旅游行为。这一定义精炼地表达了生态旅游的两个要件:第一是到自然区域中旅游,第二是对当地环境和居民具有贡献。20世纪90年代,生态旅游概念被引入中国,随后学术领域和实践领域对生态旅游报以了充分的精力和热情,生态旅游已经成为官产学研媒共同青睐和推动的旅游产业中的宠儿。但严格意义上,我国生态旅游发展似乎离生态旅游提出的初衷渐行渐远,其根源在